

《潍县志稿》还原“党治”卷

本报记者 秦昕



新出版《潍县志稿》部分。

民国潍县政府再修县志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党治”卷当时的情况，记者与潍城区档案局(馆)的崔馆长一同来到原潍城区档案局局长陈树林家中了解相关情况。

今年72岁的陈树林，1990年12月至1993年11月任潍城档案局局长。在陈树林的家中，墙上挂有一张全家福，黑白的照片，民国时期的装束，都是一层层记忆。

陈树林指着相册，“那个时候我才12岁”。小的时候，陈树林就很喜欢潍坊历史，现在说起来《潍县志稿》，陈树林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从1760年乾隆《潍县志》出版到民国初年,期间150多年没有续修《潍县志》。民国二十年(1931年)潍县县政府要修《潍县志》。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先后印发《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督察各地成立通志馆,进行修志。1931年,潍县长王华安奉命修方志,设立了潍县县志局,聘请了陈蜚声、刘金第、杜佐宸、丁叔言等地方知名学者、志学方家、社会活动家、乡绅名流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县志编纂委员会常委由县长王华安、教育局长高镜秋、知名学者陈蜚声组成,陈蜚声任总纂,刘金第任副总纂,丁锡田为采访部主任,陈达善、孙仙坡为编辑,郭鲁泉为缮写,丁次萱任总务等。县志局设在城里丁宅。

陈蜚声字翼如,号鹤侨,系前清进士。刘金第字东侯,系同盟会员、前清举人,是潍县第一个民社组织“智群”学社及智群小学、山左公学的创办者之一。丁锡田字稼民,号俾千,是知名的史地学家、著名乡邦文献收藏家。他们都是当时潍县顶尖的名士、学者。陈蜚声、刘金第二人,都曾经任过丁宅的家庭塾师。

民国版《潍县志》在编纂宗旨上,首先开宗明义地提出,民国时代编修方志,应以人民为主,故本志编撰宗旨在写本县数千年社会活动之遗迹,对几百年来

方志学巨擘章学诚所创义例,择善而从,又不拘泥。对于潍县已有的志书,无论是明万历版,还是清康熙版、乾隆版,他们认为,“惟所蒐辑颇有陋略,本志虽为重修,几等于创修。于旧志之缺略者,竭力补辑,其可存者,尽行采入。盖对旧志,既不敢轻侮,亦不敢盲从也。”由此,以陈蜚声、刘金第为主,确定了续修《潍县志》的总体框架与篇章章目。将全书列出了15个志目。其中第一就是党治,之后依次是通纪、疆域、营缮、民政、武备、秩官、赋税、教育、实业、交通、人物、艺文、金石、杂稽。

除删去《党治卷》,基本保存了民国志的内容。已出版的《潍县志稿》全书15编、42卷、100多万字。通体上看,除“叙录”之外,纲目、内容与《潍县志》并无二致,但《潍县志》开篇列为首卷的“党治”,却在《潍县志稿》中整体被删除了。

“党治”这一卷,七七事变前,已经印刷成册。内容既涉及到国民党潍县县党部历次党代会选举的代表、委员名单,又涉及了日本侵占胶济铁路后的诸多暴行。对于当时的日伪地方政府是十分敏感的。因此,《潍县志稿》中将明万历、清康熙、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言,归结成卷,名曰“序录”,放在卷首,取代了“党治”,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变化的。

“党治”卷缘何被删除

《潍县志稿》既然基本采用了民国《潍县志》的内容,出版时为何整体地删除了“党治”卷的内容。找到了“党治”卷,也就找到了“党治”卷被删除的答案。

“党治”卷系《潍县志》的第一卷,卷首为引言,共180字,简单论述了革命与进化的辩证关系,阐述了革命之意义后指出,“潍县自清季至今,数十年来,革命志士颇不乏人。兹就过去之事实,为详确之记载,俾其奋斗牺牲之精神,得以永垂不朽焉”。

引言之后,按“革命同盟会时期”、“国民党时期”、“中国国民党时期”、“潍县党务之整理时期”、“潍县党务之执行时期”、“潍县党务之再整理时期”、“潍县党务之更度整理”等七个时期,叙述了国民党潍县党组织的活动,洋洋洒洒2万字。并有国民党潍县全县第1至5届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县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姓名等等的一览表,共15张。其中有些章节,还涉及到日寇侵略中国、在胶济路沿线的暴行,也有以国民党反动立场污蔑和杀害共产党员的内容等等。

由此分析,日伪统治时期,“党治”卷内容既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又非常不合当时的“形势”,所以《潍县志稿》编辑出版时,剔除“党治”这一卷,改增

为“叙录”。“叙录”收录了明万历、清康熙、清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以及修志姓氏等内容。

民国《潍县志》“党治”卷的重新出现,不仅为更全面了解民国时代的潍县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而且对于今后再版《潍县志稿》这部记录了潍县上千年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加以充实,也是很有价值的。

隐藏在地下室内的铅印版

和记印刷局,原是一家成立时间较早但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1931年,由城东门大街迁到东关大街,利用集资,实行股份制,扩大经营。由丁叔言任董事长,总经理毛寄尘,正、副经理陆寿臣、陈海光。

1931年潍县设立县志局时,即将县志印刷任务交给了和记印刷局。为此,他们从武汉购进了特大16页印刷机,到上海购买了当地最先进的铜版机、照相机、制版机,又以高薪从济南聘请了铅版师、排版师。有了这些先进设备和高级技术力量,完成县志的印刷任务就有了保证。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县志稿尚有部分未完。为了保存已成的底稿,县志局要求先将其已成底稿打成纸型,并少量印刷成册,以防丢失。这样,就为后来找到散失的底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据介绍,和记印刷局职工之前曾透露,七七事变日寇侵占潍县城前夕,为了保护这部县志的铅印版,曾连夜将它隐藏在地下室内。后来,日伪人员曾多次到厂搜查,由于职工严密封口,始终未果。直到1941年,局里的几位董事,参加了常之英召集的有关出刊《潍县志稿》的会议,画押承接了印刷任务后,才将原来的铅印版取出,并派上了用场。

《潍县志稿》42卷的印刷,持续一年,内附铜版照片百余张、地图20多幅、还有大幅的潍县全境舆图。其封面设计、线装工艺都符合标准,质量上乘。说明了和记印刷局职工当年保护潍县志铅印版的良苦用心,没有枉费。

铅印本怎样保存下来的

在潍城区档案馆发现的5册铅印本民国《潍县志》本中,有一册为《潍县志·党治》。那么,“党治”卷是怎样被发现,5册铅印本民国《潍县志》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1960年初,中共潍坊市委决定编写《潍坊市志》,调时任市委机关学校副校长的陈慕虹牵头成立市志办公室,承担这项工作。在一次召开修志座谈会上,刘逊聪曾召开了当年出版《潍县志稿》,删除“党治”一卷的经过。

解放后,刘逊聪曾任潍坊市政协第三届委员,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城关文化补习学校当代课教员。1980年后,对其被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当时他谈到,“党治”原稿可能存在当年丁氏群化小学校长丁锡田先生的私人秘书杨质斋手中。

杨质斋解放后仍在市区一所小学任校长。会后,陈慕虹从杨质斋手中借出了“党治”卷并复印了一册,又将原书送还给了杨质斋。陈慕虹的复印本在用作编写市志参考后,又将它送到潍坊市档案馆(今潍城区档案馆)保存。

按照陈慕虹提供的线索,在潍城区档案馆找到了“党治”卷的陈慕虹复印本,同时惊喜地发现了当年已印刷成书的5册民国《潍县志》,其中一册就是“党治”卷。该书封面左上方为宋体字“潍县志”(大字),下有党治二字。书长30厘米、宽17厘米,竖排铅印,每页11行,每行32字,无标点符号。全书双页共34张,未注明撰写人。

这5册民国《潍县志》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据分析,一种可能是接受整理解放前旧档案留存的,另一种可能是档案馆从民间收集的。还有一种可能,当时档案馆根据陈慕虹复印本的线索,从杨质斋手中集得。

另据介绍,其中2册(不包括“党治”卷)内页上盖有“潍坊市公安局”的印章,为简体字。这说明,也有可能部分卷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原潍坊市公安局留存后移交档案馆的。因为1956年全国开始推行简化字;1983年9月撤销潍坊地区组建地省级省辖潍坊市,1984年1月原潍坊市公安局改为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

既然这5册民国《潍县志》早就存在档案馆,为何一直没有被发现,细细翻阅5册民国《潍县志》,发现其开本、纸张、印刷乃至每页行数、字数,基本上与《潍县志稿》无二致,只是封面“潍县志”三字少了一个“稿”字,又是与《潍县志稿》存放在一起,所以整理者和查阅者均忽略了。况且《潍县志稿》其他处以及民间还有不少存本,前几年寒亭史志办又影印了此书,真正仔细查阅原书者并不太多。

为了能够让更多市民更好地了解潍坊的历史,经过决策,2012年6月,在潍城区档案局局长杨国良带领下,潍城区档案馆已成为孤本的民国版《潍县志》卷首篇“党治”与《潍县志稿》一同影印,组成了26册的几乎是民国版的《潍县志》。新添加的“党治”单独成册,称为《潍县志》,《潍县志稿》依然保持原称。

这不仅为今后更加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潍县历史提供了极为完整的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将成爲研究及收藏爱好者难得的古籍佳品。

(潍城区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献)



《潍县志》原书。



原潍城区档案局局长陈树林。